

第一章 社会变迁中的失范 [员	
员 失范与变迁 [源	
圆 中国单位组织变迁中的失范现象及其结构背景 [员	圆
猿 研究的基本问题与假设以及对一些问题的说明 [员	圆
第二章 员 愿年的调查 [缘	
员 制度环境与结构性特征 [缘	圆
圆 调查数据与量表 [缘	圆
猿 不满意程度 [苑	圆
源 相对剥夺感 [愿	圆
缘 绝对剥夺 [愿	圆
远 地位的不一致性 [怨	圆
苑 失范 [怨	圆
愿 简短的结论 [怨	圆
第三章 员 怨年的调查 [员	圆
员 制度环境与结构性特征 [员	圆
圆 调查数据与量表 [员	圆
猿 不满意程度 [员	圆
源 相对剥夺感 [员	圆
缘 绝对剥夺 [员	圆
远 地位的不一致性 [员	圆
苑 失范 [员	圆
愿 简短的结论 [员	圆

第四章 圆年年的调查 [猿]

猿制度环境与结构性特征 [猿]

圆调查数据与量表 [猿]

猿爱满意度 [猿]

源爱补偿和回报感 [猿]

缘爱相对剥夺感 [猿]

远爱地位的不一致性 [猿]

苑爱失范 [猿]

愿爱简短的结论 [猿]

第五章 结语 [猿]

附录 猿年城市居民调查问卷 [猿]

附录 圆年问卷调查数据中部分基本变量的频数 [猿]

附录 猿年城市居民调查问卷 [猿]

附录 源年问卷调查数据中部分基本变量的频数 [猿]

附录 缘年北京市城市居民调查问卷 [猿]

附录 远年北京市问卷调查数据中部分基本变量的频数 [猿]

参考文献 [猿]

后记 [猿]

第一章 社会变迁中的失范

一个时代的巨变(~~明~~ ~~易~~ ~~非~~ ~~过~~ ~~能~~ ~~释~~)^① 是一个时代在社会结构、组织制度、生活方式、知识安排乃至价值取向等方面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 社会领域中的各种张力往往会以诸多的样式反映和显露出来, 而且会直接深入整个社会的基础结构, 进而由规范意义上的合法化危机引发全面的社会危机。从某种意义上说, 现代化的转型过程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危机, 就连涂尔干这样的理论家在一个世纪之前写下的文字, 也似乎能够唤起我们的切肤之痛, 成为我们面对今天的生活的由衷感叹。涂尔干说: “我们所要揭示的失范状态, 造成了经济世界中极端悲惨的景象, 各种各样的冲突和混乱频繁产生出来。既然我们无法约束当前彼此争斗的各种势力, 无法提供能够使人们俯首帖耳的限制, 它们就会突破所有界限, 继而相互对抗, 相互防范, 相互削弱……人的热情只能靠他们所遵从的道德来遏止。如果所有权威都丧失殆尽, 那么剩下的只会是强者统治的法律, 而战争, 不管它是潜在的还是突显的, 都将是人类永远无法避免的病症……这种无政府状态明显是一种病态现象, 因为它是与社会的整个目标反向而行的, 社会之所以存在, 就是要消除, 至少是削弱人们之间的相互争斗, 把强力法则归属于更高的法则。”^②

的确, 二十年来, 在中国社会所经历的改革与变迁中, 我们

也会或多或少地经验和体会到经典社会理论家所描绘的这些病痛的象征;换言之,伴随每一次的体制改革与转型,都会突出结构张力与制度变迁所导致的“冲突与混乱”。然而,倘若我们深入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从革命到改革),本身,特别是从组织变迁的角度来考察制度变迁的效果,就会进一步提出这样的问题:上述危机是否是这一社会过程所带来的惟一效果?换言之,在急剧的制度变迁所带来的整个社会范围的转型过程中,失范及其负面效应是否是这个社会所必须承担的一种“命运”,面对这样一种“命运”,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省察此种特殊的现象,并在现有的具体社会结构及其组织和制度形态中予以关照。其实,问题不止如此,倘若我们不深入复杂的社会现实,仅仅从失范表面上的去价值(道德层面)和去道德(道德层面)的角度出发去看待这场巨变,就会忽视在这一特定的社会历史阶段,行为和观念层面上的失范(失范)在重构社会组织 and 制度的过程中对形塑新时期的社会规范(失范)基础所做出的贡献。从某种意义上说,原有制度结构中的失范,恰恰构成了新的社会常规化(失范)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

本书之所以从失范及其相关社会现象这样一种表面来看负面的效果出发来检视中国社会变迁中组织和制度变迁的问题,是因为首先我们必须正视,我们正在经历的这场变迁确实在行为、价值、制度和结构等几乎所有社会层面上都曾经、正在和将要给我们带来许许多多的阵痛和冲突。这样的冲突既构成了我们最切近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了我们无法摆脱的社会命运。我们如何去考察和反思这种现象的社会基础,并勇于承担这样的命运,是今天处于现实的社会环境中的每个人所不能逃避的,但就另一方面来说,社会变迁所引致的失范

或冲突,却也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变迁本身的合理理由,如果我们不去寻找和发现这样的理由以及社会运行的规律,即便我们把失范当作命运来承担,那也不能算作是一种有理性的承担。总之,社会研究不是意见,虽然我们所研究的主题很具体,我们还是希望能够从现实周遭的困顿中脱身出来,看看我们置身其中的现实究竟是什么。所以,这项研究的起点,就是从学理上对迄今为止所有针对失范现象的理论分析作检讨。

尽管在标准的社会学分析上,“失范”(Anomie)或“失范”(Anomie)的概念与“变迁”(Change)的概念之间存在一种范畴的关联,然而,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脉络和情境出发,会发现“失范”与现代性的生成以及随之出现的内生或外生的现代化过程都有一种微妙的关系:现代化过程本身,以及与之牵连的一切社会要素,能否实现道德规范意义上的建构;“失范”是否会成为纳入到这一过程本身中的社会永远挥之不去的梦魇,是我们讨论现代处境中的所有社会构造的核心问题。即便对我们这样一种有关单位这一中国特有的社会组织及其制度模式或知识图式的经验研究来说,也必须返回到这一基本的理论问题上来。

自从“失范”进入社会学家的视野以来,就带有了浓重的“反常”色彩,无论是经典社会理论,还是以不同面目出现的当代社会理论,都通常把失范当作反常的、病态的或偏差的现象来处理。而且,人们往往也认为,失范成为社会学分析的概念,它的历史最多只能追溯到19世纪晚期,甚至只有在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和怀特海(Alfred Whitehead)那里,失范才逐渐成为社会学理论或政治学理论中的“正式”概念,成为现代性研究中越来越难以回避的一种基于特殊的“社会事实”上的理论范畴。^[1]

员 失范与变迁

按照社会学的理论流脉来看,最早提出失范(失范)并将其纳入社会分析中的当属爱弥尔·涂尔干。实际上,就涂尔干强调社会团结的理论传统来说,失范意味着一种秩序紊乱和规范缺失的反社会效果(失范)。在这里,“反社会”基本上有两层理论上的意涵:一是将这种现象确认为反常的或病态的现象,二是认为它是可以克服的。因此,失范在其理论基础中并不能构成一种核心的概念。尽管如此,在涂尔干的几部重要的著作中,失范依然反复出现,俨然成为涂尔干有关现代社会的理论中的基本难题。《社会分工论》的最后部分就曾经试图处理过“反常性分工”和“强制性分工”的问题,而且从分析的角度来说,这一问题最终也依然悬而未决;在《自杀论》一书中,涂尔干更是鲜明而又略带一丝忧虑地点到了这一症结:“贪婪自上而下地发展,不知何处才是止境。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平息贪婪,因为贪婪试图达到的目标远远超过了它能达到的目标。与狂热的幻想能够模糊地看到的可能性相比,现实似乎毫无价值,因此人们脱离现实,但是,当可能变成现实时,他们后来又要摆脱这种可能。人们渴望各种新奇的东西、未知的享受和不可名状的感觉,但是这些新玩意儿被认识以后,它们便失去了一切乐趣。从那时起,突然发生最危险的挫折,人们就无力承受……老是等待着未来和死盯着未来的人,他的过去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鼓励他去忍受现在的痛苦,因为过去对他来说只是一些亟待度过的阶段。使他能够欺骗自己的是,他总是想在不久的将来找到自己还未曾遇到过的幸福……无限的欲望像一种道德差别的标志每天都显示出来,而这种欲望只能在反常的和把反常当作规律的意识里

产生。^[1]

之所以把失范作为反常现象来处理,我们还需要回到涂尔干社会理论的基本假设上来。我们必须承认,这一理论的有机论色彩是比较浓重的:如果拿有机体(有机体)的说法来比附社会,那么健康(健康)与病态(病态)的对立,自然是社会分析中的主导范畴。^[2]在涂尔干看来,社会作为整体或机体,汇集和结合了构成社会的各个要素或细胞,社会作为要素或细胞的总和,在性质上并不由这些要素或细胞的性质来规定;由个人联合而形成的集体不同于单独个体的实体,集体作为一种特殊的实体,以外在的形式作用于个体,并在个体身上形成一种完全内在的存在。^[3]只有社会才能直接地和整体地,或者通过它的某个机构产生约束作用,因为社会是唯一胜过个人的精神力,个人必须承认它的优势。^[4]这种精神力,即为集体意识(集体意识)或集体良知(集体良知)。

实际上,诸如“公众精神”、“集体心灵”和“舆论”等说法,都不过是集体意识的社会表述。集体意识是精神生活领域中“意识的意识”,^[5]是社会生活的首要条件,是所有个体意识的统一体和集合体,社会也表现为人类意识的综合体。然而,社会并不仅仅意味着纯粹的总体性和普遍性,而是内化于个体的总体性和普遍性,成为嵌入个体的个性和主体性:“如果社会对个体而言是普遍的,无疑它也是具有其自身外形特征和个性特征的个体性(个体性)本身;是一种特殊的主体(主体)……集体本身就含有某些主体因素”。^[6]在这个意义上,涂尔干的社会决定论无疑是以个人主义的道德建构为其核心意涵的。^[7]

因此,所谓社会变迁中的“这种欲望只能在反常的和把反常当作规律的意识里产生”,恰恰意味着在原有集体意识被逐渐消解的情况下,新的集体意识并没有建构出来,并获得足够的道德

效力,也没有通过个体意识的内化作用形成新的团结,这不可避免会造成社会衰亡甚至死亡的下场。^[1]也就是说,在社会急剧变化的时期里,道德的防线顷刻之间崩溃了,个人的欲望似脱缰的野马,摆脱了集体意识所形成的自我的道德规定,咆哮般地从道德约制中挣脱出来。^[2]而在为这种现象提供的分析和解释中,有关正常与反常、健康与疾病的二元范畴成为了理论的支点。

众所周知,涂尔干社会理论的核心概念是社会事实(~~深重~~ ~~客观~~),而社会事实的存在“不依存于它在团体内部扩散时所表现的个体形式,我们可以通过社会事实在团体内部的扩散来界定它”。因此,社会事实不仅是独立的和普遍的,也具有外在的强制因素,换言之:“普遍存在于社会各处并具有其固有存在的,不管其在个人身上的表现如何,都可谓社会事实”。^[3]在涂尔干看来,社会事实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事实是应该是什么就表现为什么的事实,即所谓的正常(~~燥热~~)现象;第二种事实是应该是什么却未表现为什么的事实,即所谓的反常(~~凄惨~~)现象或病态(~~荒凉~~)现象。^[4]那么,怎样区分正常现象和反常现象呢?涂尔干认为,我们在考察社会事实的过程中,必须首先证实这项事实是否是普遍的,然后再去追溯过去曾经决定过这个事实的普遍性条件,最后看一看这些条件在现在是否仍然存在,或者是否已经发生了变化。如果是第一种情况,我们就有权把这种现象作为正常现象来研究;如果是第二种情况,我们就必须否认它是正常现象。这样,上述观点可以归结为三个原则: ~~灵~~ 当社会事实一般发生在特定进化阶段出现的特定社会里时,对于这个特定发展阶段的特定社会类型来说就是正常的; ~~圆~~ 如果我们指出现象的普遍性是与特定社会类型中集体生活的一般条件有联系的,就可以检验上述方法的结果; ~~猜~~ 这个事实与尚未完

成其全部进化过程的社会种类有关时,这种检验就是必不可少的。^[1]由此看来,涂尔干的失范理论是以常态(常态)和病态这两个范畴的二元划分为前提的,而常态的说法恰恰印证了规范(规范)作为社会存在基础的基本判断。因此,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就是正常类型,是那些普遍的、规则的和正常的社会事实,但对于那些特殊的、不规则的和反常的事实来说,社会学也不能回避,不是“无望地追求越追越远的目标,而是持之以恒地努力保持正常状态,一旦这种形态遭到破坏,就去重建它,一旦它的存在条件改变了,就去重新寻找条件”。^[2]这样一来,失范在理论意义上就处于一种两难的局面:既然失范是社会变迁中的一种反常现象,那么在有关社会变化的理论解释中就不得不说,然而,每当说到失范的时候,又不能把失范当作一种独立的社会范畴来解释,而必须将其纳入到常规状态中来解释。更为尴尬的是,由于变迁本身是无法确定的,在我们重新寻找规范条件的过程中,失范又成为了一种必然现象,而原有的常态类型又无法提供充分的揭示失范的规范基础。因此,涂尔干有关失范的解释,必须落在现代性转变的实质性的社会效果和历史效果之上。^[3]

在这个意义上,通过两种社会团结牵引出来的变迁理论,才是理清失范问题的根本线索。涂尔干有关现代分工及其所带来的有机团结的讨论,恰恰揭示了现代情境中社会决定论与个人主义之间的张力。涂尔干认为,现代分工不仅意味着职业的分化,也意味着个人的分化和异质性的增强(员)群体中的职业精神只能对特定的生活领域产生影响,个人具有游离于职业生活之外的自由生活空间(圆)相对于社会总体规范而言,职业规范在范围和强度上都减小了(猿)职业的异质性带来了职业群体的异质性,在职业群体自身发展和相互参照的过程中,集体意识不再反映为绝对的外在强制作用,而必须以内化为个人意识成

为社会作用的环节。简言之：“现代社会之所以区别于传统社会，就在于现代社会所包含的不是一个实体或一种人格，而是两种人格：即相互共存的集体人格与个体人格”。^{〔1〕}

因此，现代化过程中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紧张状态，刻画了社会决定论与个人主义之间的张力。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和自主，与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纪律是双向建构的，如涂尔干本人所说：“人是有限的存在。从生理上讲，他是宇宙的组成部分；从道德上讲，他是社会的组成部分。因此，若他不去牵制自己的本性，他就无法超越方方面面的限度……人的本性无法成其自身，除非他受到纪律的约束。”^{〔2〕}然而，社会变迁的效果，却使现代自由及其连带出来的欲望无限扩张，而社会控制的基础，即集体意识却逐渐瓦解掉了。集体意识的衰落无疑会使社会陷入道德真空状态（~~丧失道德精神~~），社会成员失去了社会的凝聚力，在意识领域内各处闲散游荡。社会的缺席（~~丧失社会控制~~）使个体意识不再具有内在的限制和约束，陷入了规范缺席的状态。“由于社会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目的，社会在感觉到我们正在逃避它的同时也一定感觉到我们的活动失去了目标……社会的压抑、幻想的破灭并非来自个人，而是表明社会岌岌可危。这些情况说明社会纽带已经松弛，这是一种集体的衰落，或是社会的病态。”^{〔3〕}失范意味着“社会在个人身上的不充分在场”（~~深刻影响着社会成员的精神生活~~），或者说是“社会的缺席”。^{〔4〕}而且，依照匹克林（~~马基斯~~）的理解，这样一种急剧变迁的根本，便是社会陷入一种道德冷漠（~~丧失道德精神~~）和道德平庸（~~丧失道德基础~~）的状态。^{〔5〕}

与涂尔干着力挖掘失范的现代道德基础这一做法相比，默顿的失范理论不仅带有浓厚的结构功能主义色彩，同时也反映出了中层理论的特征。^{〔6〕}1936年，默顿在《美国社会学评论》上发

功能作用的过程中,参与者具有主观的行动目标,隐功能则是无意向或无意识的功能系统,参与者的行动目标是潜在的和分散的。在这个意义上,功能后果本身并不完全由行动者的主观意向来确定,比如,违法者或违规者在某种意义上就能促进共同体的感情团结,麦基弗(配齐)有关无目的控制的制度效果的分析,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有关新制度衍生机制的分析,都可谓是隐功能的实例。因此,区分两种功能的意义在于,它不仅能够考虑到功能作用的具体情境问题,还能够避免功能分析中的目的论倾向,并把非理性因素引入到行动分析中来。^[10]

就此而言,失范的根源就是文化目标与制度手段之间的张力结构。首先,对所有社会成员来说,文化结构所确定的目标、意图和旨趣构成了社会行动的合法目的,它们在价值等级中呈现出整合状态和有序状态。这些目标包含了不同程度的情感和意义要素,组成了行动意愿的参照框架,如什么是“值得追求的”等。其次,文化结构还确定、规定和限定了达成上述目标的可接受的方式,即制度框架所允许的步骤。因此,对能够达成文化目标的便利条件的选择肯定会受到制度化规范(圣)的限制。^[11]然而,文化目标和制度化规范在共同构建行动步骤的过程中,两者并不一定会发生持续稳定的联系,文化对特定目标的确定与其对制度化手段的选择也不是一个同构过程,前者往往会相对独立地发挥作用。所以,两者之间的平衡,构成了整合的、相对稳定的并能产生变化的社会本身,失范问题也由此引发出来了:“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偏差可以被看成是由文化确定的意愿与由社会结构提供的实现这种意愿的途径之间所存在的分离状态”。^[12]失范的根源就在于这样一个过程:一方面,人们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竭力获取未经合法化的有效手段;另一方面,人们又在夸张化的文化目标中逐渐丧失掉对规范本

身的情感支持。

有关偏差行为的类型学就是以这样的理论前提为基础的。这种类型学并不局限于单纯的文化价值意涵,而是试图在社会结构的不同位置中确定适应这些价值的各种类型。因此,与类型有关的各种范畴所指涉的只是那些特定情境类型中的行为。据此,默顿通过文化价值与制度化手段的关系将适应模式分为五种类型(员)顺从(精)越轨(圆)革新(蚤)墨守(猿)仪式主义(愿)逃避主义(愿)反叛(愿)反叛。

在这五种适应类型中,第一种模式是最普遍的适应模式,也是最理想的社会整合状态:社会行为既可以满足整个社会的基本价值需要,又可以通过合法手段实现自己的目标,从而把社会纳入到稳定的和持续的发展轨道,不会产生偏差行为。在第二种类型中,个人在极力强调自身文化目标的同时,无法将决定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的制度规范完全内化,从而在达成目标的过程中受到了制度的阻碍。推其根由,是因为固有的阶级结构和等级秩序没有为所有人提供同等的机会,而整个社会的文化价值却不断膨胀,甚至在某些特殊群体中形成了与社会普遍规范截然相反的常规观念:即在局部领域内,对采取某种越出习俗和法律的规定范围的手段形成共识,进而攫取社会资源。因此,这种失范的前提有二:一是机会的匮乏,二是目标的扩张。社会普遍存在的价值目标无法与合乎规范的制度化手段相互协调,个人无法通过合法途径兑现自己的“实际目标”。第三种类型就是所谓的循规蹈矩,尽管这种类型就社会规范来说不能归为偏差行为,但对制度规范来说,只表现出一种顺应的态度,而非认同的态度,这种态度从根本上丧失了自身的基本价值取向和目标,只能被动地陷于既存的社会结构等级中。对纯粹的官僚制,以及改革前具有中国特色的单位制来说,仪式主义的行为不是单

纯意义上的自觉行为,而是始终受制于制度化手段,是“官僚制的行家里手”。^[1]第四种类型的基本取向就不再是适应了:既不接受共同的文化价值,也不遵从社会的制度规范,只是在虚构的意义上才算得上是个社会成员,因此,这种类型的非社会化倾向(非社会化倾向)反映在目标和手段两个方面。默顿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一种类型,是因为文化价值和制度手段之间形成了双重冲突:“与制度手段相适应的内化的道德责任同诉诸非法手段的压力发生了冲突,个人被排斥在合法和有效的手段之外”,尽管社会的竞争秩序依然可以存在下去,但个人不得不在文化价值和制度规范的双重层面上“离开”社会。不过,这些偏差行为也会在特定的情境下相互融合,形成特殊的群体,并在文化上建构一种“亚文化”。

在默顿看来,有关失范的研究中,最后一种类型最有意义。这是因为,反叛在文化目标和制度手段两个问题上都表现出了肯定和否定的双重倾向,也就是对现行的文化结构和社会结构表示不满并加以改造的倾向。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反叛对结构本身做出了适应性的反应,其中含有价值转换(价值转换)的重要因素:在排斥和去除原有价值的同时,宣扬重建一切价值。同样,就制度体系来说,反叛者也把原有的制度手段看成是满足合法目标的阻力。因此,若使社会达成结构转换的“目标”,反叛本身就不能单纯诉诸个体,而必须诉诸群体。

不过,默顿并没有把失范的分析限定于群体的层次上,在1936年的一篇文章中,他把失范区分成两个概念:失范和失范。在他看来,我们必须将个体的失范状态与社会系统的失范状态区分开来。失范指的只是社会系统的匮乏状态,而不是系统中某个人的心理状态(失范的社会根源问题)。失范是指某种社会环境的条件,而失范则是指特定社会条件下的

特别行动者的失范状态。换言之, **疏**是具体个人从社会规定的目标和规范中疏离出来的过程,而 **疏**则是“从相对于其他目标的某些目标中疏离出来”的过程,是系统意义上的目标匮乏状态。所以,在某种意义上, **疏**是 **疏**的扩散过程;然而,恰恰是这样的说法,往往会使上述两个概念的界分排除掉对 **疏**的形成过程进行意义解释的可能性,很容易造成概念的同义反复和解释循环。^[10]

尽管默顿的这两个概念在逻辑层面上显得比较混乱,可他后来所强调的失范在社会结构和个人心理层次上的效果,无疑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有关失范的心理学层面的讨论。麦基弗指出,心理学意义上的失范状态直接来源于当代社会的特殊情境,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员)在文化冲突中,社会个体已经陷入了茫然无措的状态,正像韦伯所说的价值领域中的诸神纷争一样,他们既被无数的价值体系包围着,又从来无法作出任何绝对意义上的价值抉择,价值的冲突本身造成了解释现实和筹划未来过程中的价值空白。(圆)现代竞争中,蕴涵着价值意义的规范(**疏**)已经被仅仅具有组织意义的规范(**疏**)替代掉了,工具理性强占了实质理性的地盘,借助外在强制形式剥夺了个人的主体意识,手段俨然成为目的和价值本身。(猿)社会的急剧变迁使暴力采用符号形式渗入整个社会的文化结构中,既在深处使个人形成了虚假的自我认同,也瓦解了集体意识的同一性。因此,价值的缺失已经不再单纯表现在结构和制度层面,反而更明显地表现在个体心理的层次上:“个体对社会的归属感和依从感彻底地崩溃了”。^[11]

20世纪 60年代,大卫·里斯曼从性格学的角度划分了三种性格类型:^[12]具有传统取向(**疏**)的个人往往把文化作为一种习惯的统一体,而不将自身作为特定行为模式的主

体,在这个意义上,社会通常在参照和约定的意义上以羞涩感(遵规守纪)来控制行为;内向(内向型)的人往往会由各种权威来规定他的心理机制,社会通过犯罪感(羞耻)来控制他的行为;外向(外向型)的人则会将行动范围扩展到更广的社会空间中,尽管他会表现出一副普世主义的姿态,更喜欢急剧变迁的社会环境,可是在心理层面上却会时常产生焦虑感(焦虑)。里斯曼认为,西方社会在历史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的社会转型,而这与上述三种性格是相应的。特别是随着现代化、民主化和消费化的发展,整个社会在人口构成和文化取向上都已经变得多元化,主流文化逐渐消解,价值越来越显得非常不确定,从而使人的性格更为灵活善变,越来越呈现为外向的特征,“焦虑”也随之成为社会的主导情绪。[1]

列奥·斯罗尔则通过“失范量表”对失范开始尝试进行定量分析。他认为,有关失范的假设源于希腊文中两个相对的词语:有序状态和失序状态,当然,这两个术语也可用于对个体行动及其相互关系和参照群体进行考察。[2]因此,默顿区分有序状态和失序状态的意义在于,它们既可以对失范的社会状态和个体状态分别加以澄清,也可以将两种状态相互进行参照,个体的心理失范不仅可以作为对社会失调状况的反映因素,也可以对社会的构成或拆解过程产生反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体的有序状态-失序状态模式可以被看成是在人格因素和社会因素交互作用的背景下的变量模式,有序状态与失序状态(非整合)也有相同的意义,意味着“个体对外群体普遍持有的拒斥倾向以及个体对小群体特别持有的拒斥倾向”。[3]既然我们可以把个体的心理机制看作是由有序状态-失序状态构成的一个连续体,那么,在理想的状况下,这一模式就具有两种极端的表现。首先,有序状态指的是一种自我与他人的

归属状态(清遠則歸順, 清遠則歸順, 清遠則歸順), 个体能够明确地认同自己的角色, 与群体之间也能够形成和谐的秩序; 相反, 疏离是指自我与他人的疏离状态(清遠則疏離, 清遠則疏離, 清遠則疏離), 个人在与他人进行互动或以群体为参照的行动中, 并不能明确自身的角色, 疏离与归属不能相互认同。在这个意义上, 斯罗尔所说的失范与阿尔布瓦从自杀现象所引出的失范概念比较切近。阿尔布瓦认为, 失范实际上就是个人无法在自我和身份的社会框架中将自己构成一个社会行动者(深遠則失范), 所以才会产生孤独、痛苦、焦虑和畏惧的感受。〔獮〕

受上述理论的影响, 当代社会学开始在多个向度上对失范问题展开探讨, 如结构失衡理论(疏離則失范, 疏離則失范, 疏離則失范)、亚文化或反文化理论(宰制則失范, 宰制則失范, 宰制則失范)、符号互动中的习得和扩散理论(月言則失范, 月言則失范, 月言則失范)、心理学理论(配符則失范, 配符則失范, 配符則失范)、标签论(耗言則失范, 耗言則失范, 耗言則失范), 诸如此类, 等等; 此外, 亦有某些社会学家从拟剧论(则变則失范, 则变則失范, 则变則失范) 或常人方法学(远則失范, 远則失范, 远則失范) 的角度来阐发失范情境的社会反向证成过程; 当然, 也有学者剖析了失范在情感现象学意义上的社会根源(先景則失范)。

与此同时, 在经验研究方面, 紧扣社会变迁的主题, 也出炉了一些颇有见地的见解。〔獮〕英格认为, 当代社会是一个诸多价值领域相互作用和反作用的复杂系统, 核心价值的边缘化倾向乃是失范的根源; 〔獮〕特拉维斯着重讨论了在理性化的官僚体制下, 个人的边缘境遇及其带来的失范效果; 〔獮〕阿夫沙尔和巴茨利明确指出, 从后现代性的角度来理解, 失范的形成过程实际上正是一种解构的构建过程; 〔獮〕加尔通认为, 当今全球社会存在的失范现象, 呈现出一种总体社会(则若則失范) 逐渐消解的趋势, 这种消解不仅是规范意义上的, 即所谓的 焚燒則失范。